

郑国郑姓



西周末年,周宣王封同父异母少弟姬友于棫林(今陕西华阴县),建郑国。姬友谥号桓公。到了周幽王八年(公元前774年),郑桓公在朝廷中担任司徒之官,廉洁奉公,为大周鞠躬尽瘁。但是,周幽王姬宫涅重用奸臣,宠幸贵妃褒姒,王室内部矛盾激化,加上戎兵的威胁,内忧外患,朝中百官,惶乱不安。郑桓公为周朝社稷忧心忡忡。

周幽王十一年(公元前771年),西周王室的申侯勾结犬戎,大举进攻,占取西周京城镐京,这就是“犬戎之乱”。在此以前,周幽王姬宫涅曾“烽火戏诸侯”,假报战警戏弄诸侯以博得褒姒一笑,几次之后诸侯们便不再信任周幽王。镐京大火四起,火光映红了黎明前的夜空,火舌浓烟吞噬着王宫的房舍,杀声、悲号声不时传来,浓烟滚滚的街道上,一簇人马拥护而来,“犬戎”字旗在飘扬,一骑兵上前向犬戎一大将报告说:“报告大将军,四处火起。”犬戎大将踌躇满志地说:“再多放几处火,看那姬宫涅往哪里逃。”又一骑兵飞奔而来,勒住马向犬戎大将急报:“启禀大将军,搜遍王宫不见姬宫涅。”犬戎大将吃惊地说:“呵!”胡可汉说:“肯定是随郑伯姬友那老儿去郑国避难了。”犬戎大将对胡可汉说:“速派轻骑,务必在壩上、骊山截获姬宫涅。”胡可汉领命转身带领骑兵向壩上、骊山急驰而去,犬戎大将又命令其他将士全力追击,兵发骊山。

夜幕笼罩着山野,黑鸦鸦一片,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处传来,越来越近,一团模糊的暗影,逐渐显出三匹骏马拉着一辆四轮马车,在十几个骑士的护卫下,急驰而来。车上,周幽王睁着惊恐的双眼,向前焦急地探望,褒姒抱着太子,蜷伏在一旁,满脸的悲怆。车后,郑伯姬友率领十多名护卫紧紧跟随。在急促的奔跑中,已是踉踉跄跄,在后边的护卫向郑伯郑桓公姬友报告:“司徒大人,后面发现追兵。”郑伯勒马向后观看,周幽王正在车上提心吊胆地扭身张望忍不住惊呼道:“啊!追兵已到!”远远望去,在逐渐消散的晨雾之





中,有数百名骑兵,在旷野上风卷而来。驾车手连扬数鞭加快地赶车,极力表现自己的忠诚说道:“大王,您不要惊恐,烽火已点燃,只要诸侯救驾的大兵赶到,就可以安然脱险。”幽王愤恨地说:“那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赶到?诸侯们都不要天子了?”郑伯郑桓公姬友纵骑赶到车的一边,本想安慰周幽王,但听此言规劝说:“这,怎么能怨恨诸侯?”周幽王不满地说:“事关社稷存亡,万分火急,而救兵迟迟不到……”郑伯姬友说:“那也怨大王您自己,您烽火戏诸侯,把诸侯弄得不相信了,他们谁还会上当,发来十万军供您一笑呢?”周幽王张口结舌,无言以对。

小河蜿蜒奔流,周幽王的车渡河难行,郑伯率领护卫也逃进河里,犬戎追兵越来越近,郑伯举目观看周围地形说道:“大王,您速速逃走,让老臣抵挡他们。”周幽王无奈地说:“全靠您了,王叔!”周幽王的马车过河急驰而去。郑伯调转马头,手提长剑,立在桥头,身后的十多位骑兵护卫,像雁翼一般在郑伯身后排开,满脸的悲壮,向急追而来的叛军怒目而视。

犬戎大将的追兵拥向桥头。郑伯挥动长剑向追兵砍去。身后的十几名护卫也挥舞兵器,截杀追兵,混战在河边。越来越多的追兵向郑伯和护卫们围拢。犬戎的兵从两侧趟过小河。郑伯正奋力拼杀,已砍倒十多个敌将,忽见敌兵已过河向幽王的马车追去,心中大惊,急忙回身向马车飞奔而去。护卫们奋力拦截追兵。郑伯在闯过两股追兵之中,飞骑去救周幽王。马车两侧的追兵越来越近,车上的周幽王抖成一团,裹似惊骇万分,用长衣袖挡住太子的眼睛。马车左侧一敌将大喝一声:“叫你逃!”一剑把驾车手从车上挑下。马车右侧的敌将纵身从马背上跃起,扑到马车上,挥起长剑,砍中周幽王,双手抱头的周幽王发出一声惨叫,鲜血向四处飞溅。拼命赶来救驾的郑伯怒睁悲愤的眼睛,大喝一声,举起长剑直劈马车上的敌将,敌将还没有来得及转身,就被郑伯刺杀惨叫一声,便滚下马车。后面追来的两名敌将随即赶到,刀砍枪戳,直向郑伯的背后砍来,郑伯来不及转身,天旋地转,郑伯支持不住,跌落马下,鲜血从郑伯的肩膀向外冒出,他无力地抬了抬头,愤怒的眼睛睁得大大的,望着从身边飞奔而过的敌兵铁蹄,望着骊山上那浓烟裹着火光的烽火昏死过去。周幽王被犬戎叛军所杀,周军将士死伤过半,都城沦陷,西周灭亡。郑国郑世子掘突袭位,是为郑武公。郑武公掘突与卫侯姬和、晋文侯联合出兵,打败戎兵,斩杀申侯,平息叛乱,拥周平王宜臼继位,又协助周平王迁都洛阳,史称东周。

郑武公协助周平王东迁,有功于天子,继郑桓公后再任东周王朝卿士。但此时郑国地处西北,版图不大,郑武公召集亲信听取计谋。郑国大夫说:“其洛水、伊水、颍水之间乃为必得之地。”

郑武公与众部下察看了洛水、颍水后又快马赶到虎牢关,派出的各组人马回报说,周围地势俱已清楚:虎牢之地,山势险要,间有川谷,田野肥沃,山林物产丰富;北临气势汹涌的黄河,南靠绵延几百里崇山峻岭,西连洛阳,东接中原大地的诸多侯国;宁日此处乃是粮产富足,百姓安乐;战时此处则是交通隘道,兵家必争之地。武公感慨道:“此一方乐土,应归我等,兴我郑国!”众将士齐声赞呼。

郑武公经过周平王的应允,率领郑国军队攻打地处虎牢关南部的邻国,邻国兵士阵

前起义,邻国灭亡,土地归郑国所有。郑武公又对虢国(虎牢关东部,史称东虢国)恩威并用,虢国君王虢丁假意屈服,在公元前767年秋虢丁宴邀武公,意在杀之,被武公识破,兵围虢国都城,内外夹击,虢国投降,归附郑国。自此,郑国以京(今新密、荥阳间的襄城)为都,后又迁往新密建都。

东周初年,因时势的变化,当时各诸侯国上卿、大夫都热衷于另立姓名,不少贵族或以先人的名、字为姓;或以国名为姓;或以祖上谥号为姓等很多种。凡以国为姓者,多是国力强盛或臣民表达爱国之情的象征。郑国兴起,国强民富,郑武公为进一步巩固统治、奠定基业,故召集群臣平民,庄严地宣告:“我大郑国,蒸蒸日上,日渐强盛。先王桓公生前就有让臣民以国为姓之夙愿。今日,为缅怀先王,为我郑国团结统一、永葆昌盛,举国臣民以国为姓郑氏,不知尔等意下如何?”顿时下面欢呼四起,高声叫好,众臣民皆激奋不已,载歌载舞,久久不散。以国为姓,郑氏从此繁衍发展至今。



郑姓以国为姓。郑国初建于今陕西华阴县,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,郑国随迁到今河南省新密市,后又迁到今新郑市。图为春秋时遗留下来的郑国古城墙。



附:荥阳郑氏望族地

天下郑氏出荥阳,荥阳郑氏遍天下。是说郑姓的产生以及形成望族在荥阳。郑氏是以国为姓的中华大姓。在中国大姓排名次上占第二十三位;由于郑氏家族开拓精神强,是我省向福建、广东迁居而又侨居外国、次于陈氏的第二大姓,也是当前台湾十二大姓之一。追本溯源,就得从公元前806年、周宣王22年封弟姬友为郑伯算起,直到郑国被韩国灭后,一部分迁陈、宋之间,一部份留荥阳,遂以国为姓,确立郑姓。郑姓后裔,公认郑桓公为郑氏始祖。所以,为了弘扬郑氏文化,追念祖德,启迪后人,加强团结,继往开来,



很有必要对郑姓先祖,尤其是得姓始祖的研究和确认。

郑国三卿——郑桓公、郑武公、郑庄公三代为周司徒,左右周朝天下106年。而到了郑厉公二十八年,又在国势稍安、厉公患病的情况下,迎逃难的周惠王住于栎邑,并三次进入洛邑,勤王奋战,才平定了王子颓叛乱,又为周室整理了一次宫廷,恢复了王尊。而周惠王仅赐予厉公“虎牢以东的武公之略”是不够的。从这段历史看来,郑国从一建立就与周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。

郑桓公从建立郑国起,便帮助周宣王中兴、周幽王治国,忠于周室,宣传周礼,是有开拓精神的一代明君。并在犬戎之乱,殉忠周室。武公更在周厦将倾之时,助王东迁,建立成周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庄公尊王平乱,而王不礼并于夺司徒卿时,才发生了周郑交恶。当周桓王率诸侯伐郑时,视聃射王中肩,欲再复一箭,庄公急止再射,保王一命。并使祭仲犒王及其左右。郑厉公更不计前仇,平王子颓之乱以勤王,作为郑国国君的主要梗概。从桓公议东迁,武公佐平王东迁时而举国东迁,并建武公之略;庄公伐宋破许建立新郑及启封城;厉公勤王,又收回武公之略等,奠定了郑国基业的根本。

从社会发展史上看,郑国建立之初,奴隶制开始解体。国人暴动,使周厉王吓得躲藏彘地,不敢回京。而太子靖暗藏在召公家,被国人知道了,非杀死他不可。还是召公为了解除国人之围,被迫无奈,将自己的孩子送与国人杀掉,才保存了太子靖,这是多么残忍而悲痛的场面啊。后又经过召、周二公周旋调和,才使国人平静下来。国家大权由召、周共和执政,虽然国人解除了武力,但周厉王是不敢再赴京当天子了,只好由太子静登基,名存实亡长达十四年之久(公元前841年——公元前828年)。奴隶制的周王朝一蹶不振,曾有过变革,但诸侯不听召唤。于公元前806年,由于姬友助王中兴有功,周宣王在王畿之地,划出一块地方,封为郑国(伯爵)。郑桓公曾一度到各诸侯国宣教王礼,但奴隶制再不能固若盘石了。

周宣王是在国人的喊杀声中惊恐万状地坐上王位的。从《纲鉴》上看:宣王原名“靖”,后改为“静”。他当王后,心有余悸自不必说。由于诸侯及西戎的叛王,他不得不尚武专征,在封郑之后(宣王二十二年)到宣王中兴(三十三年),宣王一度曾是“寡人好乐好色”。只是在姜后代罪祭天(见《列女传》)桓公力谏的情况下,才又为政图强,靖边理民,兴起“宣王中兴”的大业。对这个中兴,郑桓公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,所以,才会得到宫廷卿相及诸侯的好评。

此时的周王朝已无多大实力,边远诸侯多不以尊王为忠务,人们头脑里已淡化了“忠义”之道,都是在经营自己的国家。周宣王的国防差使、财政收入逐年减少,各地的诸侯国,逐渐由朝王、进贡、听调变为不忠、不礼、不贡,甚至是自行其事的小王国。国人暴动后,周召共和,无有诸侯联军振旅以强周室,说明奴隶制的解体、王权的没落。周宣王的中兴是王身周围的中兴,伐四戎伐诸侯,是自身振国威的事情。在宣王时代能挂起帅的,恐怕只有郑桓公一人,因为此段历史未见有诸多人物出现。召、周二公只会念周经,当时是无人听的。周王朝要存在下去,文治已不足,武事更无力,当时只有郑桓公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实干家。不然的话,王畿缩小、诸侯不贡、国库空虚、再割一片封郑国,宣王是不干

的。

从郑桓公看,从小就接受了国人暴动的洗礼,十几年中生活在动乱的王室中,他生于内忧外患之时,陶冶了他的伟大品性。他要振兴王室,光靠口若悬河地解释周礼是不行的,必须有文武双全的才干,才能做周室的支柱人物。郑桓公具备这些条件,才被宣王赏识,封为郑伯。所以,郑桓公作为郑氏始祖,为郑国的事业,乃至子孙之昌盛,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对后世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。

郑国431年的存在,经历了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形成的全过程。评述郑国各代国君,不能脱离当时列国形势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。一部《春秋》便记载了这个国家存在的要义,一部《左传》更记载了郑国各君的史况。总之,由于郑国各君能守祖业,遵祖训。所以,自郑武公发迹荥阳之后,各代郑君艰苦创业、忠王爱民、发展工商业、提倡乡民教育、任用贤臣,尊重商民信约等重大国策上,都是勋绩昭著的。

郑氏三公总论

郑氏一开始,由于郑桓公(分元前806年—公元前771年)、郑武公(公元前770年—公元前744年)、郑庄公(公元前745年—公元前701年)当郑国君,而郑桓公都棧林,郑武公都荥阳京城,郑庄公都郕国故地。郑桓公任司徒4年,郑武公任司徒25年,郑庄公任司徒37年。按周公卿任司徒为周王室到各诸侯间进行宣传国威、进行周礼教化。所谓当时的周礼,即是周公之礼,三纲五常的绝对化。即全国的人(诸侯)民(农奴及奴隶)均属于王。国家是王、诸侯(公侯伯男子)、民(较自由的农奴、及奴隶—商人、战俘—指战士及平民)逐级进行统治。这些周礼,是要司徒懂得三纲五常,并到列国进行教化,这便是司徒的职责。由于郑桓公为司徒,他才对国情的变化十分理解。《郑桓公谋迁国》首篇便书桓公为司徒,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,问于史伯曰:“王室多故,余惧及焉,其何所可以逃死?”

从郑桓公的“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,”可以了解“得”的手段。此时天下,从周王室到诸侯国对王礼都不十分认真了,周幽正逐后杀子已使王纲、父纲、夫纲颠倒,各国诸侯不正不朝,已成惯例。这样已造成了“王室将卑,戎狄必昌,不可逼也”之势。而郑桓公如何顺其势而取得周众与东土之人的心呢?他是“循势成理”的结果,用现在的话说,即:“顺从形势的发展,订立自己事业发展的规划”。

郑桓公按照史伯之言(历史的前进规律)选定新国址“济洛河颍之间——今荥阳地区”,才会“公说,乃东寄拏与贿,虢、郕受之,十邑皆有寄地。”拿钱物去贿赂人,来发展自己的国家,在当时这种手段是受王礼束缚的。作为俊杰的郑桓公是非变通“王礼”不行,这就给郑氏兴国指出了—一个正确的导向。郑桓公的这种举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。那也就是说,绝对王权的奴隶制要崩溃了,新兴的封建制要萌芽了。这个社会历史的规律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但是旧的思想体系仍然在制约人,所以,郑桓公只是谋迁国,关于迁国、建国的天职,还是留给了武公、庄公……为什么桓公不迁国,只是寄拏而已,重





要的原因是在君昏臣佞的周室,加速了困难。桓公并没有趁国难去逃死,而身体力行地去为王护朝而死。正因为他死的伟大,后世历史称桓公为忠勇门阀。假若他借机东迁,对郑氏的评价就会另有一说。

郑桓公作为公卿,为国尽忠;作为郑国第一个君主,谋国东迁定向,一生为周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、为郑氏有为的开业始祖,实为万幸!

郑武公终其一生,和郑桓公一样,南征北战、东征西伐,历尽了征战的奔波之苦。他的得江山,不像有的太子有现成的城都宫殿。他的父亲桓公死于国难,械林之郑国毁于兵焚。郑武公带上一支郑旅,转战于枪林箭雨之中,何处安身?尚是问题。东都何在?荥阳的京城连个影子还没有!虽然他没有立锥之地,但他还要护驾东征,只是名义上的郑伯,驱逐西戎的马上英雄,建立成周王城的卫士。郑桓公寄孥郕、虢之间时还有械林郑国的收入,行作贿赂,幽王失国后使郑国连个根据地也没有了。郑武公只是郑伯,周平王还没给他司徒。郑武公报清楚自己的身分,他请准王命,振旅灭郕(公元前769年),除了营建王城而外,又领导郑民建设了荥阳京城。周平王看到郑武公有了根据地,并且军力过人,才于“癸酉三年(公元前768年)以郑掘突为司徒:初桓公为司徒,善于其职,甚得周众,又死于犬戎之难,王命其子掘突缙父之职,复为司徒。”说明郑武公这个卿,是享父之职。总之,周平王看郑武公有力保朝,并且遵守王礼。郑武公受封公卿之后,才进一步来完成了《郑桓公谋迁国》中提出的建设郑国的计划。于公元前767年灭虢,兼有虎牢之地,并且安抚了郕、弊、补、舟、依、蹊、历、华八邑,尽成了郑土。

郑武公是按桓公的遗训办事,其后的发展不大,虽然武公又作了两件最突出的事:一是开发滩涂,被称为“武公之略”;二是以司徒之职,解放拘集在成周的殷商遗民,这对郑国后世的巩固起到了固本作用。

《郑桓公谋迁国》中公曰:“周其弊乎?”对曰:“殆于必弊者也。”公曰:“若周衰,诸姬其孰兴?”对曰:“……其在晋乎!”公曰:“姜、嬴其孰兴?”对曰:“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,秦仲、齐侯,姜、嬴之俊者也,且大,其将兴乎?”通过这段对话,已告诉了郑氏子孙要看到天下大势,周室要衰亡,诸侯如何兴起,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。郑武公在朝,王室的情况应该十分清楚,不能只守不拓。因为越是无能之王,就愈会在近畿之臣身上打主意。这便是郑武公得而复失的“虎牢、武公之略”原因。是时的天下大事,秦侵西域、齐掠东北、晋并北疆、楚占江岸,连昔日周邑,也被秦文公以兵七百,东猎至渭,营邑建都。周王室衰微,诸侯皆叛。郑武公本可以借公卿之权,伐叛君,扩大领土。但是,郑武公却依然如故,尊王卫道。就是在被周平王夺走了虎牢和其东边的武公之略的情况下,他忠心尊周,行止有礼,这就是郑武公。正是他这种精神,维护了周王朝表面上的统一局面,获得了郕国当时在荥阳地区臣民的拥护。

郑武公,即掘突。公元前770年,桓公死于国难,掘突继位史称郑武公。郑武公生于忧患,是雄才大略的人。郑武公的命运和郑桓公一样:国难频仍,宫室多故,君昏无道,佞臣弄权,引起社会动荡,杀声四起,处于杀王灭国的地步。郑桓公只是谋东迁,为郑国东迁打下了基础,迁都荥阳,建立京城,收买民心,征伐虢郕,兼并八个附庸小国的任务,是

留给武公去完成的。西周末期,作为防守战具的“城”的建筑,已具相当规模。“城”是盾的作用的扩大,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。古代战争是夺城之战,“争城”实际上就是夺国。看郑武公对京城建筑,确实是费了相当大的精力,奠定了郑氏在荥阳兴起的根基。

公元前770年,郑武公协秦襄公、卫侯、晋侯奉迎周太子宜臼于申,东迁洛邑,建立王城。而处于新郑国周边的虢、郕乘“周乱而弊,是骄而贪,必将叛君”。郕国首先对郑武公勒索贿赂,并要逐郑族出境。郑武公不得不“奉辞伐罪”,于公元前769年,即武公二年,用闪击式的战略战术,灭掉了郕国,确立了郑国的地域基础。“郕国国君之所以被很快地灭掉,除了郑武公有一支精锐的部队而外,更重要的原因是郕国国君贪财,失掉了民心,“民之所欲,天必从之”。郑武公灭郕之后,集训兵力,发展农桑,并解放了三百年以来的商奴,这就为郑氏勃兴打下了牢固基础。商代后裔为了谋生,他们不得不做生意,去积极发展工具技术来谋求资财,商遗民是工、商能手,并蓄有财富。郑武公用契约来盟誓:“尔勿我叛,我勿强贾,毋或巧夺。尔有利市宝货,我勿与知。”(见《左传·昭公十六年》),他解放商取为其所用,奠定了郑国振兴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的基础,连以后的《弦高犒师》《烛之武绹城退秦师》中的弦高和烛之武都是商遗民中的报恩者。

由于郑武公促使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政策的附合民意,周平王于公元768年,癸酉之岁,召武公加封:继其乃父之职,为司徒,作为卿士,管全国教化。

郑武公蓄积了力量,认为时机成熟,才书言虢公之罪:不勤工,不助王兴建东都之罪,伐虢灭之,兼有其地。并与此同时,乘机兼并了郕、弊、补、丹、依、历、华等八个子男小国。国土扩大了许多,开始了以荥阳京城为中心的郑国活动。

郑国此时西有虎牢险关,东与宋国接界,北濒大河之险,南与许国相邻,是郑国鼎盛的发展时期。郑武公十年,才娶申侯女为妻,是为武姜,这已经是公元前761年的事了。这个时候的郑武公已是30多岁。郑武公的身心全部投到了郑国的发展和建设上,真是“兴王兴国不遗余力,治家治业何弃子夜。”

郑武公十年之后,国家安定。由于连岁征战,民事多废,国库空虚。荥阳西、南山多地少。在这汜、索、溱、洧几条河流沿岸,虽有农业垦殖的条件,但发展前途不大。解决民众温饱,国库空虚的问题摆在面前。看到河阴、荥、济水两岸有大量滩涂、荒地需要开垦,便实行奖励农耕政策,三、五年内郑国大富,兵力极强。周朝其他卿士对郑武公由忌妒到诬陷,周平王听信谗言,迫使郑武公交出虎牢。理由是虎牢险关是成周东方的门户,如果王失虎牢,便不成其为国家,无存身之地了。

郑武公和郑桓公一样,“愚忠有余”,尊王礼让。为了遵从王权,不得已交出了虎牢关,这是公元前752年的事,即郑武公19年。虎牢既没,京城失去屏障,大片可耕地无卫城可护,荥阳西部及滩涂之地无法保护了,郑武公不得已向郕国故地迁都。

自从周平王夺虎牢之后,使郑武公的据河东征,凭险击许的计划破灭了。忠于周王室的他,不得不重新考虑另谋出路的问题。好多史书把郑武公的营建虎牢、开发滩涂、解救商奴、建设京城,称之为“武公之略”。从“武公之略”上,可以看出武公的雄才大略,由于周平王的没收虎牢,东侵制邑等手段,致使郑武公的事业未能大发展。直到郑厉公平





王子颓之乱,周惠王只给他武公之略虎牢以东的地带,可见虎牢地险的重要性。

武公之略的发展,应从郑武公四年(公元前767年)开始,到郑武公十九年(前752年),周平王迫使武公交出虎牢及武公之略为止。

武公之略的主要内容是开发荥阳。作为郑氏兴业的根据地,当时的荥阳是大禹治水后的荒山荒地。郑武公对开发滩涂又使用了许多优惠政策,吸引那些流离失所者。滩涂的开发使郑国粮草充足,国库殷实,逐渐富强起来。这是武公之略的主要内容之一。《左传·昭十六年》郑子产说的:“昔我先君?与商人皆出自周,庸次比耦,以艾杀此地,斩之蓬蒿、藜藿而共处之。”说明郑武公本身对奴隶制就十分轻视,开始向封建制转化了,以农为本立国的郑国,很快地富强起来。

武公之略的第二个大内容,是建设虎牢与京城。古代战争即是争城夺国之战。一个国家有一个牢固的国都,这个国家才能保存下来。所以,许多国君要把建设国都作为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。郑武公的战略方案里,建设虎牢城,应与建设京城并重。

虎牢,原属东虢,郑武公灭虢之后,归郑。虎牢,北临大河,南有群山,扼东西大道的咽喉。营建虎牢城自是谋划中事。按郑武公的战略计划,扼虎牢以拒卫晋;建京城以固本而击宋陈诸国,可以使郑国很快勃兴起来。郑武公的营建虎牢的战略眼光是很远大的,为巩固郑国400多年基业起了重要作用。

商奴是商灭时周王定下的永久奴隶。郑武公释放商奴,从战略眼光看,是兴郑的重要手段。这些商奴从思想上永远忠于郑国,突出的战例有“弦高犒师退秦兵”、“烛之武缒城退秦师”等。这些战例突出地说明了商民为了报恩,弃家卫国的大智大勇。从整个郑国历史看,由于周平王夺去虎牢及“武公之略”,郑国的南迁与东代虽也占领了一定的地盘,但始终在列强中成了楚、晋出气征代的对象国。伐郑也好,救郑也好,都是要让郑国付出人力、物力作代价的。但三百多年来,郑国没有倒下去,除了郑氏族众团结紧密,众志成城以外,商权得到解放,誓死保卫郑国的力量,更是不容忽视。

郑国生产力的发展,与解放商民也很有关系。他们没有政治上、特权上的要求,只有用积极劳动、改良工具、减少强力劳动的手段来换取生活上的幸福。开发滩涂给了他们劳动的广阔天地和攫取幸福生活的资本;在活跃商品流动上,他们贩卖牲口,打造车辆,制造生产上的锄、耨、铸、斧等多种工具,可以去各国赚钱。他们在发展郑国的工、农、商诸业上起了促进的作用,这对郑国武、庄、厉、文四公发展郑国的事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可惜的是武公之略的事业,只是坚持了一个阶段,结果失败了。失败的原因,分析起来,至少有这三个方面:其一、郑武公严重的尊王思想,在周平王为了周室利益,强夺虎牢的时候,竟让了出去,使荥阳失去了西卫,武公之略的大部土地遭王侵吞;其二,迁都密邺之地,是一大失策,虽然新都避开了主家势力的冲击,但只能是传险而居的保守局面。直到庄公继位后,虽有侵许伐宋之举,毕竟是避强就弱,后来造成周王朝与郑国夺地、夺利演出了“周郑交恶”、“周郑交质”的局面,结果周王朝使出了强硬手段,夺了郑庄公的司徒之要职。说明郑武公让权,助长了王权势力的发展;其三、郑武公一直操心兴国事业,对教育孩子一直不注意。假若教育武姜,使两个孩子团结兴郑,郑国的发展那将是不可估

量的。可惜的是郑国失去了列强初兴,郑国势强的优势,闹了一次兄弟争位的内战。削弱了国力,也影响了周王室及列国对郑国的看法。历史上虽留下了“黄泉会”、“庄公思孝”的佳话,但此次事变之后,庄公对京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,使镇守荥阳的中坚力量遭到了削弱,对郑国的再度强大失去了可靠保证。武公之略当是武公之伟大,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,免不了有失信义。但总的说,仍不失历史的光彩。郑武公也有不少失策的地方,其中虎牢的建城问题就是一大失策。虎牢城当建于周穆王养虎的同时,因为虎牢北河南山,东面、东南面是丘陵起伏的侧坡地带,在当时应是周王春、秋打猎的大型围场。特别是周穆王于此建虎牢,更应同时建城。郑武公灭虢据虎牢,对虎牢城应是一次扩建,此次扩建的城十分大,所以才会使周平王认为虎牢是东方的门户,以王权强夺之。周平王强夺虎牢之后,郑武公感到失虎牢则唇亡,守郑都——荥阳的京城则齿寒,不得已地迁都郕密新址。

虎牢城的重要,为以后的历史证明。连公元前 673 年郑厉公平王子颓之乱,使周惠王这个流亡天子复了职,才封给了郑厉公“武公之略,虎牢以东”。虎牢仍是紧紧地握在周王手里,说明虎牢的重要。“城虎牢”,不应作开始建虎牢城讲。“城虎牢”,应作取虎牢讲。古代称为“邑”的,应是都已建了城的地方。总之,虎牢之失,亦郑武公之失也。总结一下郑武公由于思想、行动上的局限,失去了开拓疆土的天时,失去了虎牢、武公之略的地利。武公的一生,虽完成了桓公东迁的未竟之业,奠定了郑国四百年的基业。郑武公不但是东迁兴郑的首要人物,而且是为开拓荥阳立下丰功伟业的英雄。他是周天子的股肱之臣,平王东迁若无郑武公的极力周旋,在定国、建都、扩大国家威力上,都是很难办的。所以,郑武公文武全才,是个竭力宣讲三道的武圣人。

郑庄公继祖、父之职为王司徒。郑庄公一上台,先要营建郑都于郕地。因为武姜的偏爱,使十五岁的国君不得已的时刻防范萧墙之祸。特别是武姜要求封段于京,把荥阳这片大好地区给了段,引起朝野震动,丞相祭仲要他改变对段的封地。他不得不用“多行不义必自毙,子姑待之”的道理来说服祭仲。大叔段也是个英俊人才,他扩建京城,修缮甲兵,发展农桑,扩充军备。《诗经》上的《叔于田》《大叔于田》等都是歌颂大叔段的。若兄弟团结,发展郑国,当斯世无敌。可惜的是,在武姜的偏爱纵容下,致发展到二十一年后,却是酿成了一场兄弟残杀的国祸,削弱了郑国国力影响到庄公当政的 22 年,没有向外扩展。

只是到公元前 722 年《郑伯克段于鄢》,第二年的“黄泉会”郑庄公安定了内部。郑庄公无后顾之忧了,于是才雄心勃勃的开展了广泛的征战活动,成了周室左右天下的主角国。

郑庄公和他父亲一样,在国家大事上是俊杰,而对后妃、孩子的教育上就差了。好在郑庄公这个世子(长子)有能力,妥善解决了萧墙之祸,挽救了郑国。而郑庄公的失误,遇到公子忽就不行了。宋国来了个“扣相交换世子”便干涉了郑国的易君内政,结果是四个公子争江山,造成高渠弥杀公子忽、立王子,结局又是齐侯杀王子仪。

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,周王室看到对郑伯之需要少了,便疏远了郑庄公,预谋夺他的





王权。郑庄公不吃这一套,便产生了取温之麦,取成周之禾的不礼行为,形成周郑交恶的局面。一直到周郑交战,此实是咎由自取。一直演化到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夺郑伯政,并以王师帅诸侯伐郑,造成祝聘射王中肩。可是在王师败绩的情况下,郑伯又派相劳王及其左右,尽了王道之礼。郑庄公是有理、有节的,但一定在不损害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。

由于王的无礼,还是罢了郑庄公的政。以后的六年,郑庄公不当司徒了,但他在发展郑国事业上,不仅没有影响,进而更有扩展,使郑国达到了繁荣昌盛时代。郑庄公时代,是郑氏三卿106年创造的黄金时代,是荥阳闪发光辉的年月。它告诉人们地灵人杰、人杰地灵互为因果。是郑氏三卿的天才与智慧,是他那艰苦创业的精神,使荥阳大地发出了时代的光芒,也是荥阳的独特地理位置及山川灵秀,造就了郑国400年基业及光辉灿烂的郑氏家族。

春秋时期是天下纷争的战乱时期,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难逃战乱之苦,历数代被韩国所灭,国已经不复存在,但是郑国精神永存,先祖功德永存,郑氏家族、郑氏后人永远牢记国史、家史,继往开来,再创辉煌。

附:郑氏部分历史名人

郑姓自东周初以国为姓诞生以来近二千八百年,世代繁衍生息、人口众多,形成很多望族,如荥阳、汴梁、洛阳、南安、漳州、潮安、浦江等。其中尤显荥阳望族持续久远、达官贵人层出不穷。仅在唐朝时科举考中进士的河南籍有97人,其中荥阳望族郑氏就有22人。历史上荥阳郑氏有六状元、八駙马、九宰相、五十六侯之说,形容郑氏在朝做官很多的“郑半朝”传为佳话。郑姓名人辈出,为家族续写千古辉煌,其中在二十五史中列传的名人就有443人,其中战国时期8人,秦朝时5人,东西两汉时19人,三国时5人,魏晋南北朝时41人,隋朝时5人,唐朝时61人,五代十国时15人,南北宋时87人,元朝20人,明朝时120人,清朝时57人。以上仅仅是国史上所列名人数量,由于国史编撰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原因,大量的英雄豪杰、志士仁人、圣贤儒道、才子居士未必能够符合国史的要求而进史册,恰恰这部分又是绝大多数的。故郑氏名人与其他各姓名人一样,除了二十五史上记载的之外,还有更多的名人,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,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
在战国末年,韩国水利工程专家郑国(人名),奉韩王安的使命,前往秦国游说秦王嬴政修泾河渠。韩国的目的在于消耗秦国国力,减缓东征对韩国的威胁,但客观上却真为秦国修了一条长三百余里的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的灌渠。该渠由郑国领导勘察设计,并亲自督导施工,西引泾水、东注洛河,可灌溉四万余顷田地,竣工后从此关中成为沃野,秦国也更加富强。该渠也以郑国的名字命名“郑国渠”。西汉有郑弘历任淮阳相、扶风太守、御史大夫,郑崇任尚书仆射。郑当时,是西汉陈郡(今河南淮阳)人,少年时是侠客,曾闻名于梁楚之间,汉武帝即位后任他为鲁中尉、济南太守、江都相,后拜为大司农。他廉

洁奉公、不聚私财,并爱慕贤良,常向武帝推荐善良贤士,为时人所称道。东汉时河南开封人郑兴、郑众父子同朝为官,分别任太中大夫、武威太守、议郎。他们虽为高官,但更注重研究经学,对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周官》有独到见解。著有《春秋难记条例》等,成为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家,其后又有北海高密(今属山东)人郑玄,他曾入太学,又跟随张恭祖学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等,聚众讲学,弟子多至千人,他潜心研究著述,注解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等,有《天文七政论》、《六艺论》等专著传世。三国时河南开封人郑浑,跟随曹操征战,历任下蔡、邵陵令、上党太守、京兆尹、沛郡太守等职。他重视农业、兴修水利、扩大稻田、财政收入大增,政通人和、民众安居乐业。北魏孝文帝时河南开封人郑羲,举秀才,拜为中书博士。他博学多识、机敏决断、官运亨通,再升中书令、兖州刺史。因他的女儿被孝文帝召进宫中,故其家族各兄弟、侄、子、孙子均在朝任官。其兄郑连山、郑白、郑小白,其子郑懿、郑道昭,其孙子郑恭业、郑严祖、郑敬祖、郑伯猷、郑幼儒、郑辑之、郑先护、郑思和、郑贵宾、郑仲明、郑季明等一家祖孙三代共二十八人,权势庞大,令人咋舌。其中有9人先后任州刺史、4人任上将军、5人任太守。

隋朝时荥阳郡(今河南荥阳市)人郑泽博学多识,著有《乐府歌辞》八卷、《乐府声调》九卷。唐朝时荥阳郡(今河南荥阳)人郑余庆,大历年间进士,曾两任宰相。在位期间喜以古义议论朝政,深得时人称颂。贞元年进士郑浣及其子同朝为官。郑浣历任河南尹、山西南道节度使、户部尚书,其子之一郑从谏会昌年间进士、拜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郑、郑颢祖孙二人也同朝为官,分别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、礼部尚书兼河南尹。还有郑州荥泽(今河南郑州西北)人郑珣瑜及其两个儿子郑覃、郑朗都先后拜相。荥阳人郑畋十八岁中进士,唐僖宗时拜为丞相。郑姓人士在唐朝时相对于众多高官而言,文人雅士却较少,见于史册的是郑州荥阳人郑度,他著书八十余集,善画山水,爱书法,能写诗,唐玄宗李隆基赞誉诗书画为“郑度三绝”。



1991年5月台湾郑氏寻根访问团一行23人回祖地寻根谒祖



明朝时有襄阳(今湖北襄樊)人郑继之,嘉靖年间进士,官至吏部尚书;上饶(今属江西)人郑以伟,万历年间进士,官至礼部尚书;建宁(今属福建省)人郑赐,洪武十八年(公元1385年)进士,历任监察御史,工部、刑部、礼部尚书等职;福建南安人郑成功,明末福建总兵郑芝龙之子,历封南明忠孝伯、延平公。清兵进入福建后,其父无奈降清。他率军在南澳抵抗清兵、称为招讨大将军,举明桂王永历年号和旗帜,以厦门为根据地,转战福建沿海。清朝朝廷多次招抚,他都不从。后来他在厦门训练水师,在顺治十八年(公元1661年)率水师渡海攻打占据台湾的荷兰人,围城数月后,荷兰人投降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,遣送走所有外国人、制定法律、设官定职、兴办学校、开垦荒地、发展农牧渔业,使台湾得到重新发展;还有画家郑板桥,其书画风格劲峭明朗,独尊一派;著名作家、文史学家郑振铎;著名史学家郑天挺;著名剧作家、戏剧评论家郑伯奇等等。



新郑出土春秋时期郑国莲鹤方壶